

廣德文史資料

第三輯



廣德文史資料

程新林



政协广德县文史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封面题签 程劲枫
封面设计 龙其川
责任编辑 韩宗荣



内部发行
广德文史资料
(第三辑)

编辑出版：政协广德县文史委员会
制版印刷：国营广德县印刷厂
出版日期：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安徽省新闻出版局A90·104·

工本费：二 元

目 录

著名的地质古生物学家许杰

.....孙耀东 (1)

郭沫若与杨正宗

.....钟 梁 (7)

许道琦生平简介

.....寒 山 (14)

回忆杨默仁先生

.....吴宗良 (17)

难忘的往事——辛亥革命前后广德见闻杂记

.....郑维辅 (20)

北伐军在广德

.....倪宗璁 (25)

兵运轶事

.....王渊波 (33)

十年萍踪忆点滴

.....周柏堂 (37)

戴笠为何保举广德县长?

.....金正琪 (57)

抗战初期的广德机场

.....王用羽 (59)

我军战敌机 群众擒飞贼

.....家炎 宜祥 纪辉 (61)

攻打砖桥据点纪实

.....郭石生 (62)

广德围歼战

.....倪宗璁 (68)

广德花鼓戏艺人传略

.....黄相忠 (77)

艺林散记

.....晋 峰 (82)

广德民间表演团体“合义班” 和“新三元班”

.....黄相忠 (90)

1949年广德教育工作纪事

.....郑书琴 (93)

广德城池始末

.....任伟俊 今逢 (96)

水龙与水龙会

.....郑书琴 金珍月 (99)

范仲淹与《桐川范氏宗谱》

..... 杨跃庭 (103)

《禁开煤山碑》浅析

..... 马用之 (108)

明清至建国前广德行政区划的演变

..... 金正琪 (111)

日喀则地区见闻

..... 韩宗荣 (119)

挟票三例

..... 雷天庆 (126)

兵寇秘录

..... 今逢校阅 (128)

著名的地质古生物学家许杰

孙 耀 东

许杰同志是我国和国际著名的地质学家和地层古生物学家。他1901年农历正月二十九日出生在安徽省广德县誓节渡一个农民家庭，七岁上学，先后就读于广德县立一小和浙江吴兴（今湖州）省立三中。1919年中学毕业，他抱着“实业救国”的愿望，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受到李四光教授等名师的培育。在两年预科和四年本科的大学生涯中，他参加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受到了进步思潮的熏陶，同时也获得了扎实的地质学知识。

1925年，许杰大学毕业，同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各地的工人、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预示着一场大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渴望投入火热斗争的许杰，婉辞了政府部门的聘任，回到安徽，一面在安庆建华中学等校任教，一面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怀宁中心县委委员。北伐军抵达武汉后，他受党组织的委派，奔波于安庆和武汉之间，做联络工作。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严重，组织上通知他迅速转移隐蔽，后辗转回到家乡，受聘在广德中学任教务主任兼教员，半年后便辞去教职前往上海。1930年的一天，许杰在上海巧遇时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的李四光老师，李教授喜出望外，当知其尚未谋到合适的工作时，立即举荐他进了地质研究所。

从此许杰便开始了致力于地质矿产调查和地质研究的活动。

许杰同志在其毕生的科研活动中，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了笔石动物群和含笔石地层的研究工作。笔石是生存在古生代一种绝灭的海生浮游动物，由于它的痕迹很像保存在岩石层面上的笔迹而得名。笔石动物群演化快，分布广，盛衰期分明，成为古生物学中一个重要门类，是鉴别古代早、中期，特别是奥陶纪、志留纪及早泥盆世地层的十分重要的标准化石。许杰在笔石的系统分类、演化、生态，笔石体的构造，以及笔石带的划分与对比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著的成就，为我国的笔石学研究做了奠基性的工作。1934年，他的第一部专著《长江下游之笔石化石》一发表，就引起国内外地质古生物界的轰动，受到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被誉为具有国际水平的经典之作。该专著中建立的笔石带序列，至今仍被广泛地作为地层划分、对比的标准。1965年，他发表的题为《关于笔石体的复杂化》论文，表明了他的笔石研究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78年8月，许杰同志不顾年近八旬的高龄，长途跋涉，驱车前往新疆霍城果子沟实地考察奥陶纪地层，并将这一地区不同的笔石混生带与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笔石群加以对比，进而探究笔石地质的分布规律，提出了地球上笔石发源中心的问题。这对于研究全球笔石动物群的地理分区、古生代地层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1982年秋，他在皖南旌德县召开的笔石学科第二届学术年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奥陶纪笔石动物群的特征及含笔石地区地层的划分和对比》报告，再次对笔石动物群发育中心和控制因素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探讨，这一研究成果把我国笔石学研究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1988年11月，《许杰笔石论文集》出版，这是

他五十余年笔石研究成果的结晶，标志着我国笔石学科的研究水平，受到国内外学术界人士的推崇。该书被国家科委评为1984年优秀科技书刊，荣膺一等奖。

作为一名科学家，许杰同志的研究领域十分广阔，学术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他对腹足类、三叶虫等古生物地层，中国南方第四纪冰川和湖北、云南等地的地质矿产作过大量研究，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底，他和友人一起租了一条小船，从湖北宜昌出发，不畏艰险，溯江而上，全程实地考察了长江三峡地区的地质剖面，为三峡地区地层划分、对比和化石带的建立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由于许杰同志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方面的杰出贡献，1958年被苏联古生物学会授予名誉会员称号，1985年被联邦德国地质学会授予当年最高科学奖——莱欧波尔德·冯·布赫奖，成为该奖自1946年设立以来获此殊荣的三十七名各国著名地质学家中第一位中国地质学家。

许杰同志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先辈。早年，他参加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后又投身于第一次国内大革命。三十年代初，他在国民党统治区翻译了斯大林的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到内地，1943年任云南大学矿冶系教授，在昆明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中央研究院迁回南京，又亲赴皖南山区给新四军送通讯器材、药品等。全国解放前夕，他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并说服中央研究院的同事，共同抵制了国民党南迁研究院的企图。南京解放后，他任中央研究院接管组组长，受到陈

毅同志的亲切接见。不久，他又奉华东军政委员会之命，接管和改组了安徽大学，并担任安徽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校长。1953年，他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民盟安徽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在此期间，他团结大批高级知识分子，为建设新中国作出很大的贡献。

1954年，许杰同志被调任中央地质部副部长，长期分管地质科技等方面的工作。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下，于1959年组建了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并兼首任院长。随后他还相继组建了中国地质图书馆和中国地质博物馆。这些机构的设立，为我国地质科技事业的发展进步，发挥了重大作用。

许杰同志在长期担任领导工作中，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艰苦实干的工作作风，他曾多次深入全国各地地质勘探、海洋物探等基层单位蹲点，搞调查研究，检查指导工作，足迹遍及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同时，他还多次主持召开全国金矿、铀矿、铅锌矿、钾矿、钨矿等专业现场会议，总结地质找矿经验。在关心和指导地质教育、地质编图、地质实验和水文地质工作方面，他也倾注过大量心血。十年动乱期间，许杰同志在极其困难的处境中积极指导中国地质图、亚洲地质图、中国区域地层表的编绘出版，以及地质辞典等大型工具书的编辑工作。同时，他协助李四光教授撰写《天文地质古生物》一书，其中有些章节和附图，就是由他执笔撰写、编绘的。李四光逝世后，他又组织领导李四光遗著的整理和编纂工作。这些默默无闻的工作，都为我国的地质事业作出了十分宝贵的贡献。

为了开展国际地质科技的合作交流，推动我国地质事业的进步，许杰同志多次率团出国考察、访问或参加国际会

议，多次接待外国政府官员或地质学家的来访。1957年冬，他参加我国赴苏科学代表团，参与制订中苏两国科技合作协定和我国发展科技的十二年长远规划。1966年2月，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赴非洲参加桑给巴尔独立节的庆典活动，并视察我地质援外组的工作。1976年，当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之后，他又率领中国地质代表团前往澳大利亚悉尼，出席第二十五届国际地质大会和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第五届理事会。会上，他在题为《中国地质工作的发展》报告中，向各国朋友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地质事业的迅速发展和取得的重大成就，引起国际地质学界的极大重视。他在多年的外事活动中，广泛地与各国政界、科技界的要人、学者、名流进行接触和交往，为增进我国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提高和扩大我国地质工作在国际地质界的地位和影响，作出了贡献。

许杰同志在六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勤奋不懈，孜孜以求，为党和人民作出了突出贡献，党和人民也给予他重要的荣誉和责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应召赴京，出席全国科学会议的筹备会议，商讨发展中国科技事业的大计。1954年9月起，他连续当选为一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后又当选为五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6年2月起，任中国民主同盟二至五届中央常委、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1950年上半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1957年起，历任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代理事长，名誉理事。1959年当选为全国地层委员会常务委员，1979年当选为该会副主任委员。同时，他还是中国科协荣誉委员，并长期担任中国古生物学会常务理事。1979年起，他改任地质矿产部顾问，1980年

7月兼任该部科技委员会主任。

许杰同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他在地质事业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更为世人瞩目，其业绩将载入史册。许杰同志在晚年虽年老体衰，病魔缠身，仍关心国家大事，时时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作风正派，品德高尚，平易近人，谦虚谨慎，律己严格，待人宽厚，学风严谨，锲而不舍，勤奋求实，一丝不苟。他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是激励我们建设广德、振兴中华的生动教材。

1989年7月11日，许杰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9岁。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万里、姚依林、宋平、王震、温家宝、彭冲、费孝通、宋健、邹家华、方毅、谷牧、周培源、钱学森、钱伟长、苏步青送了花圈，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国务院办公厅、地质矿产部、民盟中央、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中国地质科学院、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古生物学会，以及安徽省和广德县人民政府等送了花圈。温家宝、费孝通、钱学森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本文根据许杰同志生前秘书汪熊麟同志提供的材料整理而成，谨致谢意。）

郭沫若与杨正宗

钟 梁

凡是读过郭沫若写的《脱离蒋介石以后》^①一文的人，一定记得这样一件事：郭老反蒋后，被困在安庆，幸逢政治部留守南昌的杨正宗同志，带了一条船到达安庆，才使他得以乘船逃出了虎口。这个杨正宗是何许人，与郭老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想把自己所了解到的有关情况写出来以供读者。

杨正宗，字默仁，广德县人，早年在宣城师范读书时，因参加恽代英领导的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后转入湖州三师读书，1924年毕业，回乡教书。1925年，他去上海找恽代英，要求参加革命，恽介绍他到安源煤矿第一工人子弟学校教书，校长是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主任黄静源同志。杨到校任教只有两个月，就因该矿资本家勾结军阀逮捕了俱乐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杨和各校教师也被捕了。关押三个月后，黄静源同志被杀害，其余的人一律被驱逐出境。他随同在押人员一起被送到湖南株州释放，并被警告永远不许入境。

杨被释放后，无法回家，便应一难友（同校教师）邀约，到武昌附近渔家湖暂住。这时他把几个月的铁窗生活写成一首题为《寒囚》的新诗，寄给创造社，不久被刊在1926年1月1日出版的《洪水》半月刊第8期上。不久他所写的

另一首题为《我的生命流》的诗又被《洪水》（1926年3月1日出版）刊登了。他从此与创造社发生了关系。1926年他去上海创造社出版部找到在那儿当工友的同乡梁预人。梁对他说：“郭先生曾经关照过，如果你到了上海，请一定去见他。”当晚杨见到了郭老，郭老称赞勉励了他，并希望他留在上海。

杨正宗在上海并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只是搞搞创作，也常到郭老家聊天。郭老想请他做自己的家庭教师，他考虑到安娜对孩子很娇惯，怕教之过严影响关系，就推辞了。不久他又回到广德继续教书。新思想与旧势力总是格格不入的，杨正宗在家乡实在呆不下去，后来应梁预人之约，去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工作。他乘船路过安庆时，恰巧从一张报纸上看到北伐军已经攻下南昌和九江，总政治部在南昌设立了办事处，郭沫若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任驻赣办事处主任的消息，非常高兴，便同梁预人商量，决定在九江下船，先去南昌找郭老。

他俩到南昌时，郭老正准备动身去庐山开会。郭老问明来意后，劝他俩不必去西北军，就留在南昌工作，当即写了一封信，叫他俩第二天去找秘书李民治接洽。

第二天，梁不想留下，要回上海。杨送走梁后，找到李秘书，李按郭老信中的指示作了安排，派他与一个姓方的人去景德镇开展工作。当时景德镇地区的军阀刚刚退走，各种社会团体（如工会、农会等）急待组织。杨在景德镇工作了近一个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回到南昌后，正遇办事处宣传科因领导不力进行改组。郭老提名让杨当科长，获得了通过。杨接任宣传科长后，认为该科主办的《国民革命军日报》办得太差，应该加强力量。郭老说，这个问题他曾考虑

过，只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杨说，创造社出版部有一个办得很活跃的小刊物《幻洲》^②，其后一部分《十字街头》的主笔潘汉年，笔锋大胆泼辣，可以邀来办报。郭老立即同意，叫杨代拟一份电报发往上海。潘汉年接到电报后，随即来到南昌，此后《国民革命军日报》果然办得颇有特色，郭老很赞赏。

蒋介石到达南昌后，野心日益暴露，他成立了一个“法规整理委员会”，借以提高自己的威信。各部负责人均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郭老当然不例外，可是郭老仅仅参加了开幕式，以后便叫杨代表他参加这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委员会会议，自己不愿再去了。杨白天代郭老开会，晚上还要处理本科公务，日夜不闲。1926年除夕，总司令部设宴招待部直校级以上干部，当时有几个蒋分子高呼“蒋总司令万岁”口号，蒋介石默然领受而不加制止，暴露了蒋介石的野心，很多正直的人都表示气愤。杨看看郭主任，似乎无动于衷，感到奇怪，因为郭老一向有强烈的正义感，今天为什么装样呢？隔了几天，杨找机会向郭老要求请假去武昌，借以了解真情。郭老便同他谈了那天宴会上发生的事情，认为蒋介石肯定会背叛的，目前形势严重，不准请假，并表示歉意说，自己考虑欠周到，使他过度劳累，决定免去他宣传科长职务，任命他为第二秘书（或称助理秘书），继续代表自己参加“整理法规”会议。

1927年2月，安徽军阀陈调元（驻安庆）和王普（驻芜湖）先后到南京投靠蒋介石，蒋把他们分别编为三十七军和二十七军，同时命令第二军（代军长鲁涤平）进驻安庆，为他的东下作准备。这一年孙中山先生忌日（3月12日）的纪念活动，因大雨推迟到15日才举行，并放假一

天。谁知15日下午，郭老接到总司令部的命令，要他率员随总司令东下，办事处不动，派人留守代行部务。郭老即决定李民治带队随他东下，由杨正宗负责留守南昌办事处。杨怕自己难以胜任，表示不愿留守。郭老当时未作任何解释，只说这是命令，不能更改，并且说话时的态度极为严肃，杨只得服从。临行时，郭老对杨交代说，李秘书将每天用密码电报与你联系，并一再嘱咐杨不要与代行总司令部部务的张群闹翻。杨隐隐感到形势确实比以前更紧张了，他根据郭老的指示，尽量与张群敷衍，使张对他不加戒备。

郭老东下后，每天与杨都有密电联系。然而从3月23日到26日，杨连续四天未收到李秘书的电报。26日下午，张群突然派人请杨到司令部去。张群见到杨，劈头就问他是否知道郭老到哪里去了。杨知道中间定有变故，冷静地装佯说，郭主任一定跟总司令到南京去了。张群又反复追问，杨都说不知道郭老的去向，最后张群相信了，便气冲冲地对杨说：“郭沫若已经反了。”杨惊问道：“怎么反了，反谁了？”张群告诉他说：“郭沫若反蒋总司令了。”接着又大骂郭沫若没有良心，说总司令待郭如何如何好，郭反而恩将仇报。张还试图拉拢杨，表示只要愿意跟他走，他保证向总司令推荐。杨尽量敷衍了一阵，才得脱身回去。

杨知道南昌不可久留，当晚便召集办事处各科室负责人会议，说接到郭主任的密令，政治部的留守人员全部开赴前方，各科轻装出发，不准请假，不准泄密。当夜杨和留守处人员一道乘12时半的火车去九江找郭老。到了九江，好不容易才设法雇到一只小船，28日早晨到达安庆。船一靠码头，杨就只身上岸去找郭老，并嘱咐船上的人，如果他下午两点钟还不回来，就请他们把船开到武昌总部去。杨上岸后，

到第二军政治部打听郭老的下落，恰巧遇到一个可靠的熟人（名已忘）^③，才把他带到江边一个老百姓家里，找到了郭老。郭老见到杨，并知道他带了船来，喜出望外。郭老对杨说，他已经脱离蒋介石了，奉武昌总部的命令要去上海组织成立“东南分部”，李民治已经先去上海了，现正苦于没有交通工具，无法离去，你们来得正好。郭老考虑到乘小火轮直接去上海，必须经过南京，困难特多，因此决定乘船先回九江，然后改装乘外轮去上海。29日上午，船到九江，郭老仅与杨和译电员小李（名不详）三人上岸，其余的人乘原船到武昌总部去。

三个人上岸后，找了一个客栈住下。午后郭老说他要到第三军军部去找朱培德军长，杨不放心，劝郭老不要去。郭老认为朱培德与蒋介石有矛盾，应该策动朱培德共同反蒋，并且坚持只身前往。^④下午五点多钟，杨不见郭老回来，很不放心，便去第三军军部找寻，在那里看见郭老平安无事。郭老告诉杨说，朱军长已经同意反蒋，并决定派参谋长与他同去南昌，解决张群，因此他决定暂不东下。朱培德留吃晚饭，晚上九点钟郭老才回客栈。当晚，杨向郭老请假去武昌结婚，然后从武昌去上海的东南分部工作，郭老准了他的假。

第二天朱培德派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朱克靖与郭老同赴南昌，缴了张群卫队的枪械，查封了总司令部留守处，张群已先溜走。郭老就在这时写下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篇战斗檄文，并印发出去，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杨正宗销假后赶到上海，时值“四·一二”大屠杀，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东南分部被查封，许多革命者被捕。此